

一 处于双重危机中的中国

19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处于双重危机之中，一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基本确定对华采取殖民侵略政策；二是国内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尖锐，清朝末世特征毕露，中国历史又一次陷入王朝衰乱的低谷。

西方列强觊觎中国

19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过长期侵略发展后，进入迅速上升时期。英国是当时头号资本主义强国，拥有最强的综合国力。在18世纪末叶，由技术革命而引发的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新式动力机——蒸汽机装备于纺织工厂，随后又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力水平的飚升。进入19世纪，英国的煤铁产量均跃居世界前列，1795年英国的

煤产量仅为 100 万吨，到 1836 年提高到了 3000 万吨；生铁，1796 年的产量仅为 12.5 万吨，到 1840 年猛增至 139 万吨，机器更广泛的运用，推动了各产业部门的革命性变革。以棉纺业为例，机器生产大大增强了英国棉纺工业对棉花的吸引和加工能力，1771 年至 1775 年英国所能加工的棉花仅 500 万磅，1841 年，在机器生产全面取代水力生产、手工劳动后，这年英国加工的棉花达到 52800 万磅，轻纺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重工业的升级和进步。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的工厂不仅生产生活资料，也已能生产生产资料。英国的交通运输业也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加快了国内资源配置的速度和各地间经济的联系，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也大大缩短了英国与海外的距离，使英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变得更为便捷，推动了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进出口能力的增长，据载，19 世纪 20 年代初，英国的出口总值每年不过 3000 万磅，到 30 年代后期增加到年 5000 多万磅，10 年时间接近翻了一番。法国其时虽然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但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总量也相当可观。在英国取消机器输出禁令的 1825 年以后，法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跃上了新的台

阶，从 1830 年至 1839 年仅 10 时间，其运用蒸汽机的数量由 650 台跃升至 2450 台，增长了近 3 倍，棉织品的产量也增加了 3 倍。在 1840 年，法国的铁、煤产量分别到达 35 万吨和 300 万吨，进出口贸易的历史纪录不断被刷新，1838 年增至 8000 万法郎。

英法的状况基本反映了那个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和水平。英法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国内市场的饱和，引发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新经济，驱使西方资本家开辟更大的市场来推销其工业品，以摆脱危机。增加利润、拓展海外殖民地成为英国资本家的首选战略。此前，英国虽在印度和孟加拉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拥有广阔的殖民地，但仍不能满足其掠夺财富的需要。于是他们在经历近一个世纪的摸索后，把注意力和侵略矛头指向人口众多、国力孱弱的中国。

2. 江河日下的清朝统治

中国是一个拥有灿烂文明的古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中国祖先所创造的文明曾在世界独步一时，无与伦比，还在十五

六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经济总量均居世界一流水平，粮食产量、手工业品以及煤铁生产总量均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然而进入 17 世纪，当西方世界纷纷转轨变型，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之时，中国仍未能脱出封建社会治乱兴衰的循环圈。其最大特点是，社会生产仍是以满足自身需求为目的，排斥市场作用，缺乏扩大再生产动力。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主宰整个经济结构，农民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还生产自己需要的工业品。这种以消费为目的的经济与日益扩大的西方资本经济形成巨大反差。虽然在明末清初，简单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征的手工工场，但由于封建压迫和剥削，封建文化意识的束缚，这些稚嫩的资本主义盟芽并没有成长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封建生产关系仍占主导地位，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17 世纪开始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在 18 世纪末叶开始出现全面衰落，政治腐败、经济停滞、财政枯竭，军备废弛。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土地兼并现象日重一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遭受地租、捐税及高利贷的

多重盘剥，生活极其贫困，不仅无法扩大再生产，甚至无力维持简单的再生产。随着封建社会的国家控制减弱，底层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反叛行动开始汇聚，阶级矛盾走向尖锐化。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初叶，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反清秘密结社天地会、白莲教组织迅速扩大，并活跃于大江南北，这一切都预示清王朝的衰微与民族的危机同时降临。

面对危机，如果统治者能放眼世界大势，顺应潮流，厉行改革，不是不可能起衰振弊，摆脱危机。从后来历史发展的情况看，一些所谓的现代化“后来者”、“派生者”，不也是在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的交迫下启动改革、变革政治、发展经济、改良社会，走向世界的吗？确实当时由殖民者倡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已经建立，并充斥着不公平，但中国如果能自觉参与国际竞争，在竞争中崛起、发展中进步，不是不能成为第二批现代化国家。然而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是封建皇帝，这就使这种可能性变得很小；更由于中华文明独立发展中形成的世界秩序观和邦交体制，禁锢了国人对天朝以外另一类文明体系的认识，使其时的中国难以逾越走向世界的种种障碍。相反，为了维

护国内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良好、消弭可能会危害清朝统治的外来因素，清朝统治者拒绝进行具有现代性取向的变革，在对外关系上，仍然奉行传统的邦交体制，实行祖宗成法——限关政策；规定中外贸易，只有政府特别批准的商人方可从业，外商只与他们交易才算合法。

被称为“公行”（十三行）的中外贸易垄断商，不仅在中外贸易中，而且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中也起着一种特殊作用。一方面，作为垄断商，“公行”拥有承销外洋进口货物和代办内外出口货物的独占权；另一方面，他们又承担政府赋予的一定义务，这就是担保外商缴纳税款，负责约束外国商人在广州的居住和行动，充当清政府与外商之间一切交涉的联系人。清政府设立公行的目的显然是防范外国商人与国内商人的接触，制止外来势力的侵入，这一政策折射了清朝统治者的世界观和对外导向。

在世界资本主义急速扩张，各地间经济联系日趋密切的时候，中国只有主动打开大门，自觉地走向世界，以变革促发展，以开放求进步，才能有效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一切把自己孤立起来的举动，不但不能成功抵御外来的各种侵略，还会因为孤立而使自己变得愈加落

后。事实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清朝政府的限关政策，最终没有能把外国侵略者拒在国门之外。中国经历了另一种历程：“世界”走向中国。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拖入了世界市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旋涡，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下，开始自己的近代历程。

二 中西贸易的缓慢发展与 罪恶的鸦片贸易

战前中西贸易简况

鸦片战争发生之前，中西之间已有悠久的贸易历史。与中国最早发生贸易关系的西方国家是葡萄牙。葡萄牙人 1514 年来华贸易，带来了产于东南亚的香料、药材。他们从中国输入的是丝绸、瓷器。早期西方对华贸易，是挟持海盗作风进行。40 年后，葡萄牙人强租了中国澳门。随后到来的是西班牙人，他们于 1575 年在占领菲律宾群岛后，北来中国请求通商。此请得到了明朝政府的批准。第三个来华的是荷兰，时间约在 17 世纪初叶，其时正处国势不振之际，荷兰请求通商，明朝地方未予批准。荷兰殖民者采取强盗行径，用武力胁迫地方官府与之通商。他们用炮舰攻占澎

湖、台湾，筑城设守，强行贸易，由于明朝政府势呈瓦解，力不能及，荷兰得以据有台湾，进行其非法的对华通商。

英国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较晚。第一艘商船驶抵广州，是在 1637 年。此后约一百年中英中贸易关系虽维持着，但交易额很小。18 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英国生产力水平提高导致了廉价工业产品的大量增加；新式交通工具的广泛使用和传统货轮的机械化改造使英国商人远航东亚成为一件相当容易的事，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对华贸易的垄断权以后，对华贸易的积极性空前提高。此后，英国对华贸易不仅实现规模化、经常化，还开始执西方世界对华贸易之牛耳。以 1764 年的对华贸易情况为例子，该年西方国家对华贸易输入总值银 191 万两，英国为 121 万两，占 63.3%，输出总值银 364 万两，英国为 170 万两，占 46.7%。到 18 世纪末，英国对华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输入值的 90% 左右，输出值则占 70% 以上，英国后来居上成为西方国家中对华贸易的最大获利者。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特别委员会及其主席，虽然只是该公司在中国业务的管理机构和负责人，但却被清朝广州政府认作西方商界的

代言人。

东印度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1600 年，在好望角以东至麦哲伦海峡之间地区具有贸易垄断权的商业组织，是英国侵略远东的派出机构。1702 年它的垄断权获得了王室和国会的承认和保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垄断权。”东印度公司主持的对华贸易，其内容最初是将产于欧洲的钟表、玻璃制品、毛织品、金属器皿以及从印度和南洋掠夺来的香料、药材运来中国，从中国输入生丝、茶叶、土布、大黄等土产品，运回英伦销售。

在初期近 200 年的中英贸易关系中，中国一直处于有利的出超地位。从表象看，是由于中国对英国货物的需求量不大，市场很小，钟表、毛织品只限于少数人使用。而英国对于中国出产的茶、丝等货物的需求量则每年有所增加。从深层次看，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顽强地抵抗着外国工业品的大量输入。因此，在一般商品的交换上，中国始终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例如，1781~1790 年，中国输往英国的商品，仅茶一项，即达 9626 万银元，

英国输往中国的商品，在 1781~1793 年，包括毛织品、棉布、棉纱、金属等全部工业品在内，总共才 1687 万银元，只有上述茶价的 1/6。到 19 世纪，茶叶不仅是英国的必需品，而且又是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的大宗利润和税源，中国输往英国的茶叶，从 1793 年的 1600 万磅，增加到 19 世纪 20 年代每年平均 3000 万磅以上。英国的茶税由于一再提高，由 1793 年的 60 万磅，增加到 1833 年 330 万磅，成为英国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由于处于入超地位，英国商人为了获得中国的丝茶，就不得不拿出大量的银元来兑付货款。19 世纪初年，从外国流入广州的银元，平均每年约在 100 万两至 400 万两之间，以至当时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所带的货物不多，而大量的却是银元。

这种贸易状况一直维持到 19 世纪初年。这对于进入了大机器生产、积极要求扩大海外市场，以利于推销工业品、增加利润和增殖资本的英国资本家阶级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他们分析认为，英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得不到大量销售的原因是由于清政府采取的限关政策。于是他们决定采取种种手段破坏限关政策，设法打开中国的大门。

2. 从外交讹诈到鸦片贸易

1792年，英国政府在东印度公司的吁请下，以补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遣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来华，试图用外交手段打开中国的大门。1793年7月马氏抵大沽海口，9月在热河觐见皇帝。马氏按计划提出了五条要求：①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及天津为通商口岸；②在北京设立商馆；将舟山群岛之一海岛划给英国，作为英国商业基地；将广州一块地方拨给英国，供英商居住，或允许英人在广州“出入自便”；减免英货在广州和澳门之间的税额。这些要求表面上是为了通商，实质上是英国想在中国推广印度殖民模式。这一图谋遭到了乾隆皇帝的拒绝。

1816年，英国又派出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华团体，主要目的仍是为了打开中国国门，具体目标是驻使北京，谋求开放北方通商口岸，给来广州贸易的英商以更大的自由。英国的这些要求再次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由东印度公司主持对华关系之时，他们还尝试过用炮船轰开中国的海关。1820年，英国兵船在广州外伶仃洋面试探中国的防御力

量，图谋北犯。1808年，英国兵船13艘侵扰中国东南沿海，闯入虎门，被中国水师击退。1832年，冒险家胡夏米在东印度公司指使下，勾结传教士郭士立等70余人，乘武装商船阿美士德号，窜入中国南澳、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等口岸，从事武装侦察，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

然而从结果上看，英国的这两手都没有得逞。

但是，英国的第三手却得逞了：这就是用鸦片贸易改变中英贸易形势和利益流向格局。他们利用这一手达到了他们外交讹诈和冒险行动没有达到的目的。

西方殖民国家向中国贩卖鸦片，最早是葡萄牙和荷兰。他们以澳门为据点，向中国内地运销鸦片，不过数量有限。英国贩卖鸦片较晚，但发展较快。1727年英印运华鸦片200箱，1767年即达到1000箱。1773年是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英属印度政府，在这年确立了鸦片政策，同时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充分实现，给予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鸦片专卖权。1797年东印度公司又取得制造鸦片的特权。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就是在这个垄断机构的操纵下，一步步地发展起来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取得鸦片的专卖与制造权以后，千方百计地扩大鸦片的生产和输出。它强迫印度农民种植鸦片，并在印度加尔各答设立鸦片加工厂，根据中国吸食者的口味，大量调制鸦片毒品。鸦片制成后，东印度公司通过英属印度政府的官吏在市场公开拍卖给商人，然后偷运到中国来。

鸦片贸易使烟贩、印度政府、东印度公司都获巨利。烟贩以偷运逃避纳税，仅此获利不小；再是差价大，烟贩从印度进货，每箱鸦片价格为 1785 卢比，运抵中国后的销售价格为 2618 卢比，两者的差额为 833 卢比，折合银洋为 400 多元。据大烟贩子查顿称：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每箱高达 1000 银元，世上任何一种贸易均无法与之相比。印度政府是通过税收获利。据载：当时印度政府以 300% 以上的税率抽税，1829~1830 年从鸦片专卖所取得的收入超过 100 万英镑，约占印度政府全年总收入的 1/10。东印度公司是最大的获利者，由其制造、专卖的鸦片，每箱成本不过 230 多卢比（以 1813 年价），可是其拍卖价格，每箱达 2480 卢比，两者差额为 2250 多卢比，超过原来成本的 9 倍。剔除印度政府的税收，每箱鸦片东印度公司的收入即达 1200 卢

比。在利益的驱动下，鸦片贸易飞速发展起来，英印的鸦片制造厂日夜不停地开机生产，而推销商则一面组织专运鸦片的船队，往返于伶仃洋与印度之间，另一方面则将贩毒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

1800 年东印度公司在拍卖鸦片后，宣称不再参与对中国的鸦片运输与贩卖，还于 1816 年规定公司船只不准装运鸦片前往中国，违者给予经手的职员以停职处分。难道东印度公司真的要放弃具有巨大利润的鸦片生产营销？回答是否定的。1800 年以后东印度公司没有放弃鸦片利益。但它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手法确实也有改变。这种改变就是利用散商进行，自己在幕后操纵。

散商，又称私商，是指独立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外的来华做生意的英国商人。从广义上讲，还包括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的来华商人。据理，在由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背景下，散商是没有存在空间的。但在早期，东印度公司为获得公司员工的支持，通常允许他们进行一定数量的“私人贸易”。具体做法是公司给他们分配免费吨位。而获得这些好处的员工，又常常将这些吨位卖给在印度活动的散商。散商起初是付给佣金委托公司的船货管理

员在广州给他们销货进货，后来则以种种借口居留广州、澳门亲自经营进出货物。由于利润的驱动，散商的业务获巨大发展，俨然成为对华贸易的又一强手。19世纪初，英国散商在对华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攀升。在输入贸易方面，1760~1764年间散商输入值仅占英国输入总值的8%左右，到1829年则上升到80.42%，散商的输入贸易也从1760~1764年间所占的3.32%，提高到1829年的45.41%。

英国散商输入鸦片数量及比重（1800~1839）

单位：箱

年份	鸦处输入总量	散商输入量	散商输入年均量	散商所占比重 (%)
1800~1804	17808	17808	3561.6	100
1805~1809	21883	20939	4187.8	95.69
1810~1814	26067	23267	4653.4	89.26
1815~1819	48068	24928	4985.6	51.86
1820~1824	79493	53690	10738	67.54
1825~1829	100676	69995	13999	69.53
1830~1834	138825	111219	22243.8	80.11
1835~1839	205299	188817	37763.4	91.97

散商在鸦片贸易中充当了东印度公司的工具。在散商经营的对华贸易中，鸦片占有极大的比重。鸦片成为散商对华贸易的最大宗商品。以 1820 年为例，这年散商营销的鸦片占该贸易年度散商输入商品总值的 64.4%。

东印度公司将鸦片贸易交给散商是有其阴谋的：首先，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是粗重货物，运输时所需吨位大，而自中国输出的茶叶和生丝却又是轻细货，运输时所需吨位小，并且直接输往印度的也不多。公司若垄断印度对华鸦片贸易，就得承认从中国回印度航程中吨位的大量空余的巨大损失；其次，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中国经营鸦片是有风险的，因为清政府曾于 1729 年、1780 年、1796 年多次颁布禁鸦片令，一旦偷运被查获，损失巨大；再次，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的茶叶中获得巨大利润，也不便直接走私鸦片而得罪清政府，从而失去茶叶利润。将鸦片交给散商，并不意味着东印度公司就失去了控制权。对于参加对华贸易的英印散商，东印度公司采取了营业许可证制度，规定：获得许可证的商人在中国出售印度货物所得的现款，必须转交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财库，东印度公司收款后付给散商以伦敦董事会或印度政府的汇票，散商接受